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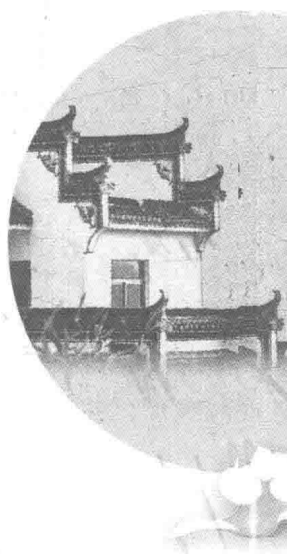
吴兆民 著

徽州文学概论

Huizhou Wenxue Gailun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

徽州 文学 概论

吴兆民 著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徽州文学概论/吴兆民著. —合肥: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7. 12
ISBN 978-7-5650-3735-1

I. ①徽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地方文学—文学研究—徽州地区
IV. ①I209.9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9357 号

徽州文学概论

吴兆民 著

责任编辑 朱移山

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
邮编 230009
电话 人文社科编辑部: 0551-62903310
市场营销部: 0551-62903198
网址 www.hfutpress.com.cn
E-mail hfutpress@163.com

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8.5
字数 186 千字
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3735-1

定价: 38.0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朱万曙

文学的地域文化性质，早在上个世纪初，就已经有学者关注和论述。汪辟疆《近代诗派与地域》就说道：“若夫民函五常之性，系水土之情，风俗因是而成，声音本之而异，则随地以系人，因人而系派，溯源于既往，昭轨辙于方来。庶无訖焉。”刘师培还曾撰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对文学和地域地理的关系进行论述。近年来，地域文化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，文学史的研究也在走向深入。但是，关于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理论思考似乎还不够丰富。我的大学同学吴兆民最近完成了《徽州文学概论》一书。因为是同学，因为我曾经对“徽学”有所涉猎，所以他命我为该书写一序言，我自是难以推却，也不能推却。借着他的大著，我以徽州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为例，谈一点对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看法，既是对兆民同学大著读后感，也和学界同仁做一交流。

一、何谓“地域文化”？

何谓“地域文化”？目前似乎没有权威和达成共识的定义。依笔者所见，地域文化，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，并经过长期积累的包括观念、风俗在内，具有自我特色的诸多文化

元素的总和。这个定义包括四层含义：第一，是“一定的地理空间”，它不仅指历代行政区划所界定的地理空间，也包括自然地理空间，例如北方的草原、西部的高原、东部的海洋、江南的山水等，这些自然空间对于地域文化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关于地理之于文化的影响，梁启超也早已关注，并有详细论说：“气候山川之特征，影响于住民之性质；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，衍为遗传。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；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。故同在一国，同在一时，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，或其度不甚相远，其质及其类不相蒙，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。”第二，地域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一定经过了长期积累的过程，在本地域，它足以成为一种传统，影响着在该地域生活的人，并且不断沿袭。第三，如同诸多“文化”，地域文化也是以观念作为核心，然后扩展到物质层面和其他文化元素之中。第四，可以称之为“地域文化”的文化，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，这种特征完全可以被感知到。

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徽州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上述“地域文化”的定义。“徽州”是一个地名，从宋代到民国时期也曾经是一个行政区域，但是，“徽州文化”确实是一个可以感知的有着自我特色的地域文化。

从地理空间上看，它位于皖南山区，境内山峦林立，其中有著名的黄山和齐云山。众多山涧形成的河流汇集为两条大的河流，一是由西向东的新安江，一是由东往西的阊江。新安江流入千岛湖，最后注入钱塘江；阊江则通往鄱阳湖。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徽州的文化的累积过程相对封闭，在经过长期积累后，具有“超稳定性”。

从积累过程看，徽州承接了中国历史上两晋、唐末和两宋

之交的三次人口的迁入。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战乱，迫使百姓们纷纷南迁，其中的一部分就迁徙到山峦为屏障的徽州，他们在这里安顿、休养生息，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文化。特别是部分世家大族，在原居地就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，南迁徽州后，仍然保持者家族的文化传统，包括儒家文化观念和耕、读的传统。宋代科举考试正常化以后，徽州的文化积累得到了一次爆发的机会，诸多士子通过科举步入仕途，既为家族带了荣耀，也垂范后世，加之朱熹自命为徽州人，进一步强化了徽州“崇学”“崇儒”的文化传统。明代以后，由于徽州人口增长，徽州人纷纷外出经商，在为家乡带来可观的物质文化的同时，徽商与徽州籍的文人将“崇学”“崇儒”的文化传统进一步予以强化。

从文化元素构成看，徽州文化观念首先就表现为“崇学”“崇儒”。明代的程瞳著《程朱阙里志》，将徽州视为“程朱阙里”，以此而自豪。在诸多族谱的“族规”“家训”中，崇敬朱子、强调遵守儒家伦理，是重要而又重要的内容。历代徽州学人的著作中，对儒家经义的阐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。由儒家观念出发，徽州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意识和组织也不断被强化，进而延伸到村落、祠堂等物质文化元素中；儒家所倡导的“忠孝节义”等伦理观念，也演变为矗立在村头田间的高高的牌坊。“崇学”的观念，转变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诸多的书院建筑，进而培育出高于其他地域的进士数量，当然，也带来了刻书业的发达以及诸多的藏书家、藏书楼。其他的文化元素也因此而显示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气象：因为文士多，所以舞文弄墨者众；因为徽商带来的富裕，所以文化消费能力强，戏曲演出之类的活动频繁，由此又催建了为数不少的戏台建筑。种种文化元素在这里汇集交错，却无不有着地域的动因，带上

地域的色彩。

最后，徽州地域文化拥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自我特征。就其表层、可视或物质文化元素看，徽州的建筑颇为独特：村落依山而建，村落中的民居一律粉墙黛瓦，辅之以马头墙，这种风格的建筑被称之为“徽派建筑”。就深层审视，一个村落，往往是一个宗族的居住地。祠堂中的祖宗牌位的庄重摆放，显示着族人敬祖爱宗的伦理情感；村口村外的牌坊，昭示着“忠孝节义”的伦理观念。精致的石雕、砖雕、木雕，既透露出徽商曾经富有的历史信息，各式各样的图案也叠印着徽州人祈求平安、祥和的愿望。还有随处可见的楹联、学者们关注的大量的刻书文献、契约文书，都共同展示了这个地域“崇学”“崇儒”的文化观念。

中国版图辽阔，地域众多。应该说，并非所有的地域都有地域文化，特别是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，不少曾经有过深厚积累的地域文化都被分割乃至消解，以至于对于地域文化的含义理解不一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难以深入，有些所谓的地域文化研究，或无比较，或自说自夸。就地域文化而言，徽州文化是一个典型的个案。透过徽州文化，我们能够对什么是“地域文化”有比较深入的理解。

二、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

地域文化与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应该是同构关系。毫无疑问，地域文化对文学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。

影响之一，是对创作主体——作家的影响。任何一位作家都出生、生长在某一地域，该地域的文学元素必然植入其记忆和心灵之中，这往往形成作家的“故乡”情结，从而又自然地渗透在其创作之中。有的作家因为仕宦或其他原因，离开故

乡，寄籍他地，时间一长，第二或第三“故乡”的文化也自然影响其心灵和创作。

影响之二，是同一地域作家之间的交往以及地域作家群的形成。文学史上的流派，往往由文学风格、主张等相同而形成或被后人概括命名，但因地域相同而结合的文学流派也是重要的现象，特别到明清以后，文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，因为“地缘”关系，更容易在交往中加深了解，形成文学创作的“群”和“派”。例如“公安派”“竟陵派”“桐城派”等都是以地名作为流派之名，其开创者和代表人物都出自同一地域，后来的成员才扩展到其他地域。又如明末清初戏曲创作的“苏州派”，则全为生活在苏州的戏曲家。近年来，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，地域作家群或流派陆续得到挖掘，例如有的学者就提出晚明诗歌中就有“新安诗群”，有“金陵六朝派”等。

影响之三，影响到作家的题材内容的选择。一地有一地之山水，一地有一地之文化景观，一地有一地之人物，一地有一地之民情风俗。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，在题材选择上，必然会将自己最熟悉的对象写入作品中。例如出生于徽州的汪道昆，在其《太函集》中，就有70多篇徽州商人和商妇的传记，其诗歌中也多有徽州景物的描写和吟咏。也有一些寄寓他乡或在某地短暂停留的文学家，同样将地方风物、人、事摄入笔端，李白晚年曾经流寓宣城一带，他的诗中，有对九华山的赞叹，也有对桃花潭的情感抒发。至于现代文学作家，地域文化之于题材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，沈从文的湘西风情、老舍的京味小说等等，无不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。

影响之四，是地域文化观念在作品中的渗透。中国自秦汉以降，成为大一统的帝国，在意识形态上，也是一统天下，儒

家思想文化在多数情况下占据着绝对统摄地位，思想史研究者关心和讨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的变化，如从先秦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发展，但却忽略了在不同地域，其作为观念支配人心的程度深浅也不相同。例如在明代中叶阳明“心学”兴起，肯定“人欲”、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已经蔚为时代思潮之际，地处崇山峻岭之中的徽州却仍然崇奉“朱子之学”和“朱子之教”，守节、殉节的妇女仍然被表彰。这些地域文化观念也必然的渗透在文学创作之中，例如汪道昆的文集中，就有不少节妇的传记。对于理学的崇奉，使得徽州地域的文学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景象：一方面，由于重视教育，这里舞文弄墨者众，乃至有诸多的诗社、文社；另外一方面，这里又没有出现在文坛有足够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。这种矛盾现象的内在原因，乃在于该地域文化观念的相对滞后。

文学对地域文化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：

其一，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往往是地域文化的显性符号。文学家因文得名，对本地域而言，是文化象征，是一份骄傲；对地域以外的人而言，是让人知晓、了解这个地域的符号，如杜甫之于成都，汤显祖之于临川和遂昌，吴敬梓之于全椒、南京。文学作品和作家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有的作品因为和地域密切相关，如苏轼咏西湖、王士禛大明湖赋《秋柳》，其对地域文化而言，同样具有重要的符号作用，它们都让读者对作品产生或所写的地方生出向往之情。

其二，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强化地域文化的自我特征，或者为地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。

在中国古代，一般而言，文学家在身份上往往是士大夫，他们有着比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因之他们往往也是思想的代言人。就地域文化而言，文学家——士大夫的不仅是本地域的文

化象征，他们通过作品表达的思想以及他们对本地域的热爱、文学描写，无不都具有强化地域文化自我特征的作用。由于具有士大夫的身份，文学家又对本地域的文化风尚起着示范意义，成为本地人仿效的榜样，地域文化的传统因此而形成，地域文化的特征也因此得到强化。

另外一方面，作为士大夫，古代的文学家们往往会走出本地域。他们本来就是“精英文化”圈的成员，在入朝为官后，他们结交的都是士大夫身份的人士，彼此之间同气相求、互相影响，原有的文化观念在碰撞中发生变化，同时因为宦游而了解到他地的地域文化，然后通过各种途径、渠道（如致仕、退隐回乡，如与家乡的书信交流）而对其原先所属的地域产生影响，从而赋予地域文化新的内涵。

分而言之，地域文化之于文学、文学之于地域文化，彼此之间都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合而言之，二者又互为同构。就一个地域文化而言，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其情形有二：一是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参与了地域文化的建构，这种参与，不仅有出生于本地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，也包括出生于其他地域却与本地域联系密切的文学家，他们或宦游本地，或长期寄居本地，或曾经短期来此游历。徽州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体现了文学家参与建构的情形，如明代中叶的文学家屠隆曾任徽州府推官，他参加了汪道昆组织的“白榆社”，和徽州的乡绅多有交谊，彼此间诗文唱和。二是本地域的文学传承和传统。地域文学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，特别是那些文化积累深厚的地域。一个地方因为崇尚文化，重视教育，必然有师承，教师往往既是学者，也是文学家，至少能诗能赋，他对于学生的文学影响就建立了文学的传承关系；另外一方面，还有家族的文学传承，父辈对文学的爱好乃至成就，

对于后代更起着熏陶作用。近年来，对于文学家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，实际上，文学家族恰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文学上的师承和家族传承，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地域的文学传统，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层面和内涵。

三、文化下移和下层创作

文学之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在明清时期有一重非常重要的表现，那就是文化下移带来的下层文学创作的活跃。明清时期，着人口增长，读书人增加，而科举取士名额有限，造成了大量读书人留滞下层社会，他们未能步入仕途，不能居“庙堂之高”，但为了生计，或为塾师，或为幕僚，或为商贾，或为乡医，甚或为方术之士，形成了读书人的职业分流现象。他们虽然属于社会下层，虽然为生计故从事的不是“士”阶层的职业，但由于曾经读书，在文化观念、文化行为上和“士”阶层保持着一致，有相当多的人也和“士”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，是下层社会有文化的群体，他们的存在和文化活动，充分显示了明清时期文化的下移趋势。

诸多的读书人沉潜于下层社会，吟诗弄文是他们书写人生或寄托心志的重要方式。他们缺少宦游的机会，留居本地的时间较多，因而在身份上更具有地域色彩，从而使得地域文学得以蓬勃兴起。从身份和经历上，我们可以将这些地域性的文学家分为以下三类予以审视：

第一类是基本上留居于本地的文学家，他们虽然曾经读书，但科举考试不顺利，为了生计而放弃科举道路。在城市，他们的职业选择可以更加多元，明末清初苏州的一批文人，以写戏为职业，如李玉、朱素臣、朱佐朝、叶时章等，成为戏曲史上的“苏州派”。他们毫无疑问是曾经读书之人，也未能或

者放弃了科举道路。在乡村，他们或当私塾先生，教书为生；或奉行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古训，行医乡里。例如创作了《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的郑之珍，据传记资料，他因为“病目”而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，做了私塾先生；明代徽州还有一位“山人”江瓘，他选择的职业是医生，而且撰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，但同时也吟诗为文，留下了一部《江山人集》。这些文学家以在本地生活时间为多，出游外乡他埠的经历少，交友面也不是很广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地域文学家”。

第二类是没有取得科举功名、既留居本地又经常游历外地的文学家。这类文学家家庭大体上比较富有，在家乡有田有产，家乡观念也很浓厚。但或者是追求人生的体验，或者因为生活的需要，他们经常游走于外地，特别是繁华的城市。他们的交友面很广，诗词歌赋既是他们和上层士大夫交游的媒介，也因此而成为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。他们参与地域性的文学活动，也因为“见多识广”而为地域文学带来新的信息。在他们的身上，体现了地域文学之间、和士大夫文学之间的互动。这类文学家在我们所研究的徽州比较多，典型的如潘之恒，他科考不顺，游历各地，但徽州又是他的家园。他的交友极为广泛，所交往的上有大臣名士，下有徽州本地的乡村读书人。他曾经邀请和陪同冯梦祯等人到徽州游历，也曾经在南京、扬州等地品曲论戏。他参加汪道昆组织的“白榆社”的活动，得到汪道昆的提携，他也和汪道昆以外的士大夫们来往密切，包括汤显祖和公安“三袁”们。徽州是他的根据地，但他的身影却活跃于当时的文化中心，这让他的视野比仅仅留居在徽州乡村的读书人开阔很多，也让他在文学创作、戏曲批评甚至文献编纂诸方面建树更多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以这种出入本土和外地的方式，沟通了徽州与外界的联系。

第三类是寄居他乡的文学家。明清以降，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，读书人也是如此。如果说，宦游还是在本籍以外的地方短暂地停留居住，大批未能步入仕途的读书人却可能为了生计而移居他地。这在徽州表现得很突出。徽州由于山多地少，从明代成化年间开始，徽州人就大批外出经商。随着商业的扩大，他们就逐渐地寄居在经商地。徽商“贾而好儒”，他们重视子孙的读书，不惜本钱。他们有浓厚的宗族和家乡观念，加之考试也必须在本籍参加，故而其子孙多在徽州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。即使不在徽州读书，也得回到徽州参加考试。自然，落选者非常多。这些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徽商子弟最终也只能继承父业，成为他们本不屑为之的商贾。他们也要离开家乡，到父辈所在的经商地去经商和生活。他们的身份比较复杂，既是商人，又曾经是读书人。经商是生存乃至家庭家族的需要，但曾经读书的经历，让他们对文化有着抛却不了的情结，其中的一部分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成就。例如明末清初居住在杭州的汪然明，清代乾隆年间主盟扬州文坛的“二马”兄弟和江春，均属于此类情形。就地域文学而言，他们于故乡徽州似乎没有参与和发生影响，而是融入所居住地的地域文学之中。

以上三类文学家，在文学史上似乎都没有什么地位。他们大多都失意于科举考试，从此委身于下层社会，自然也无从在正史上留名。而目前的文学史还是“士大夫文学史”，对这些文学家的关注程度还很不够。实际上，他们的文学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，体现了明清时期在经济活跃、文化水准提升环境之下的“文化下移”走向。他们也曾经读书，其中也不乏才学之士，只是科举录取名额有限，使得他们不能实现通过科举入仕的梦想，从而滞留于士大夫阶层之外。他们的创作，可以称

之为“下层创作”；他们的创作也带着比较鲜明的地域色彩。

四、经济支撑与文学语境

在讨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，我们不能忽略经济要素。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，其繁盛衰落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。地域文化的繁盛与否，与经济基础相关；一个地域文化是否在与其它地域文化相比显示出优越性，也与其经济实力大有关联，文学相应地在此语境中呈现出地域的差异性。

在学术界，“江南”是一个常常提及的地域概念。“江南文化”在明清两代似乎也展现出令人羡慕的繁荣气象：那里人文荟萃，书香沁鼻；那里有着众多的文士，他们活跃于朝野之间，舞文弄墨不在话下，即便是居所，也流溢出文化的韵味，那些园林建筑，曲径回廊，灵石流水，布局精巧，令人感叹。江南，是文学的温床，也哺育着诸多的高雅，如昆曲，如绘画，如轻歌曼舞，如悦耳的丝竹，如悦目而给人以舒适感的刺绣。甚至女性，也有“扬州瘦马”之流行。这一切，和京城以皇家气象为底气的文化迥然不同，和中原、山陕等地的文化色调差别更大。而形成这种差异的，除了山水地理、文化传统等原因外，经济是重要的原因。

汤显祖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徽州的诗，诗题为《吴序怜予乏绝，劝为黄山白岳之游，不果》：“欲识金银气，多从黄白游。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对于这首诗的解释，有的认为是赞美徽州，有的则认为是鄙薄徽州的铜臭之气，其实都缺乏对汤显祖写诗之时心态的考究，他是表明自己不愿意像有些文人士大夫拿着身份到徽州去“打秋风”。但是，这首诗又实实在在地透露了徽州极为富有的事实。

明代中叶后，徽商之活跃、徽商之富有，诸多的文献多有

记录。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淛在他的《五杂俎》一书中记载说：“富室之称雄者，江南则推新安，江北则推山右。新安大贾，鱼盐为业，藏镪有至百万者，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。”

新安，就是徽州；山右，则是山西。在明代，徽商与晋商是两大商帮。在他的笔下，徽州商人之富，令人称羨，他们以经营盐业致富，有的资财达到上百万两银子，那些只有二三十万资财的只能算个“中贾”。

归有光在为程姓徽商写的寿序中说道：“今新安多大族，而其在山谷之间，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。故虽士大夫之家，皆以畜贾游于四方。倚顿之盐，鸟隄之畜，竹木之饶，珠玑、犀象、玳瑁、果布之珍，下至卖浆、贩脂之业，天下都会所在，连屋列肆，乘坚策肥，被绮縠，拥赵女，鸣琴跼展，多新安人也。”

归有光分析了徽州人经商的原因，描述了徽州人经商的种类，也夸耀了徽州人经商后的豪奢生活，——“连屋列肆，乘坚策肥，被绮縠，拥赵女，鸣琴跼展”——比其他地方的人奢侈多了！

徽商的商业利润，一部分用于再投资，一部分用于消费，一部分返回家乡，用以购买田地和建筑房屋。徽州因为徽商的商业利润，成为处于江南边缘的最富有的地域之一。经济上的富有，使得徽州在文化上也得到超越于其他地域的迅速发展。于是，这个地域文学的文化语境便渐渐地变得特别起来。

其一，财富让这个地域的读书人成倍地增加，文学队伍得以扩大。

徽州本来就有重视读书的传统。对于希望能够长久保持家族荣誉和家族秩序的徽州宗族来说，教育是元宗之本，是宗族有效延续的必备手段，要最大程度上保证族中子弟读书进取。

《茗洲吴氏家典》规定：“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、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，当收而校之，或附之家塾，或助以膏火，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，作将来楷模，此是族党之望，实祖宗之光，其关系匪小。”可见，培养一个两个的读书人是为了作为后代学习的榜样，关系到家族荣誉和家族的精神动力。

徽商富有以后，更加重视子孙的教育，提供了更多、更好的物质条件。诸多文献都记载，他们广建义学、义塾，为宗族以及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，如明代歙县商人洪世沧，在吴越经商，“家稍裕，遂承先志与族党中，捐貲二千金入宗祠，以其息设义塾二堂”。清代婺源商人詹荫梧“创建义学，并置田租培植寒畯为久远计”。乾隆年间，朝廷重臣曹文植告老还乡，鉴于朱熹曾经读书于歙县紫阳山，倡议修复“古紫阳书院”，两淮盐商纷纷响应，捐银 11000 两，使该书院得以修复完成。

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，让徽州这个人口不多的地方读书人比例大为提升，其标志之一，是科举录取人数。据徽州方志的记载，在明代，徽州一地共有文进士 446，文举人 1237 人。到了清代，徽州的举人和进士更是层出不穷，文进士有 664 人，文举人 2067 人。这个数字应当包括寄籍外地的读书人，但却只是难以统计的读书人中科考成功者。读书人的成倍增加，无疑扩大了文学队伍。

其二，财富让这个地域崇尚风雅的风气愈加浓厚，文学创作蔚然成风。

人一旦富有，必然追求精神的优越。徽商拥有财富以后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风雅的崇尚，而舞文弄墨、吟诗作赋，是风雅之一种。在他们的推动之下，文学创作蔚然成风。

有个例子比较典型。歙县《泽富王氏宗谱》卷四记载：

“延宾，早能成立，商游吴、越、奇、鲁。且性颖敏，好吟咏，士人多乐与之交，而诗名日起。人谓孺人（延宾母）曰：‘业不两成，汝子耽于吟咏，恐将不利于商也。’孺人叹曰：‘吾家世承商贾，吾子能以诗起家，得从士游幸矣，商之不利何足道哉！’”商人王延宾虽然经商，却经常和文人诗歌唱和，声名渐起。有人因此他母亲建议：心不能二用，做事情也没有各方面都做好的。但这位母亲却有自己的想法：我们家已经是世代经商了，如果我的儿子能够因为写诗得以和文人交游，那么商业上小小的失利损失又算得了什么！在其他文献中，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像王延宾这样的“好吟咏”的人。例如明代休宁率口程氏家族，定期举行诗会，并且将诗作刊刻成集。

其三，财富让这个地域的文学作品得以大量刊刻。

徽州的刻书和版画，曾经被郑振铎等学者高度推崇。这是从中国刻书史或版画史的视角出发的赞赏。就地域文化的角度审视，刻书业同样因财富而勃兴和发达。财富让这个地域的读书人大增，读书人读书的需求促进了刻书业的发达；读书人既写书，又有财力刊刻出来，进一步让刻书成为产业，于是有了虬村黄氏刻工的活跃，同时也促使他们在镌刻技术上越来越精进。

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对于高石山房刻本《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中的插图是否算得上是徽派版画发展的分水岭有所争议。这个刊本的意义还在于，徽州人的财富，让能够撰写或者创作文学作品的读书人，有能力将自己的文字刊刻出来，流布于世。那部戏文的作者郑之珍虽然只是一个私塾先生，但他的父辈以及家族通过经商积累了不少的资财，尽管戏文作品篇幅很大，但他仍然请了虬村黄氏的刻工将它刊刻了出来。类似于郑之珍将自己的作品——哪怕是水平并不高的作品——刊刻